



“小说史上一段佳话” ——《清平山堂话本》的发现与研究

肖伊菲

生于宁波的浙江鄞县人马廉(1893—1935年)是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小说戏曲家。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他自小住在一间阁旁的马衙街,喜欢看小说,他可能压根也没想到过最终会走上当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研究领域。1926年8月,他继鲁迅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受王国维和鲁迅影响,他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研究古典小说、戏曲、弹词、鼓词、宝卷、俚曲等古旧书籍与文献。

他曾有三个书斋名号:曰“不登大雅堂”、“平妖堂”、“雨窗敬枕室”,均与其藏书中重要的戏曲小说版本相关,由此亦可见其藏书与治学的俗文学特色。

“不登大雅”可谓开宗明义,认定了俗文学研究的道路,宁可成为当时学界的“非主流”。古代小说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物,其文献损毁严重,以致当小说史研究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为专门学术之时,学者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即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小说文本及相关史料,均呈“无米之炊”之势;文献资料十分匮乏,研究者都有“等米下锅”之慨。

马廉曾说:“中国对于小说,向视为不屑小道,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故无人注意。即或注意,亦无加以研究者。所以现在我们研究这类东西,实在太难。既没有目录供我们检索,又没有专著供我们参考。”郑振铎亦曾无奈地指出:“小说戏曲,更是国内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不登大雅”就意味着甘于坐学术冷板凳,乐于做荒山开路人。马廉后来的俗文学成就,可以说就是把“无米之炊”做成了美食珍馐,把冷门学问做成了热门知识。

“平妖堂”的名号则直接来源于马廉的一部重要藏书,因其意外收得海内孤本明万历年间王慎修刻四卷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喜不自胜,便自号“平妖堂主人”,并将书斋改名“平妖堂”。后来,他又偶然购得天一阁散出的明嘉靖刻本《六十家小说》中的《雨窗集》、《敬枕室》,喜不自禁,更室名为“雨窗敬枕室”。马廉逝世后,周作人的挽联“月夜看灯才一梦;雨窗敬枕更何人”,更点明了《雨窗集》、《敬枕室》这两部藏书对马氏的重要性。那

么,马廉生前最后一部最重要的藏书《雨窗集》、《敬枕室》有什么特别之处?

原来,两本集子只是一部古代话本小说的残本。就当时马氏所知这部古本的另一半,还只在日本收藏,命名为《清平山堂话本》。他发现的这部残本不但填补了国内文献空白,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和日本藏本缀合成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本子,对研究明代话本小说的演变有着极高学术价值。

经马廉考证,他发现的《雨窗集》、《敬枕室》与日本收藏的《清平山堂话本》合为一书的总名应为《六十家小说》。《六十家小说》原书为六十篇,据清代《汇刻书目初编》记载,分《雨窗》、《长灯》、《随航》、《敬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十篇,共六十篇。

首先出现在日本的该书残本,起初并没有人考证过《六十家小说》的名目,而是按照日本学者的命名称之为《清平山堂话本》。这些明代嘉靖年间的15篇话本小说刻本,首先由日本学者发现于内閣文库,他们发现书板中心刻有“清平山堂”字样,于是将其定名为《清平山堂话本》。实际上,这种命名方式是不正确的,“清平山堂”只是刻书者明代嘉靖年间人洪子美的堂号,除此《六十家小说》之外,还刻有《唐诗纪事》、《夷坚志》等。这种命名方式,好比“出版社+书籍种类”的方法,是相当不准确的。但因该书首现于日本,且日本学者对此已有一定研究,“清平山堂话本”成为一个通用称谓,取代了中国原有称谓。

1928年春,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来华,向马廉出示了该书的照片。马廉随即与友人发起“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托北平京华印书局于1929年将15篇作品影印出版,仍旧题为《清平山堂话本》。与此同时,经周作人等相助,马廉还翻译了长泽规矩也的论文《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连载于孔德学校《AC月刊》1930年第1—3期。在该文“译后记”中,马廉对清平山堂主人——洪子美的生平事迹及其所刊书籍,作了初步考证。据所见文本的具体情况,马廉在为影印本所撰序文《清平山堂话本序目》(1929年6月30日)中大胆预测:“此本原书若干,今不可考,盖洪氏当时,搜罗所及,便为梓行,别类定章,初未之计也。度释体例,类似丛刻,故多收话本而亦复杂文言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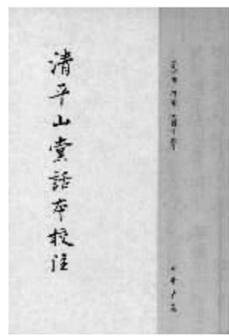
显然,马氏对此书的残本性质以及真实名称都有了初步揣测,只是苦于国内并未有此书有任何发现,只能停留于假设。为证实自己



马廉藏本影印《雨窗敬枕集》,1934年印行



《清平山堂话本》影印本,1929年“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印行



中华书局2012年3月版《清平山堂话本校注》

的假设,此后数年之中,马廉留心寻访,苦心搜求。

1933年秋,刚向修缮一新的天一阁捐献了晋代古砖,准备返回北平的马廉,在旧书肆偶然购得一包残书。其中意外的发现了12篇话本小说,版式与日本内閣文库所藏“清平山堂话本”完全一致,而篇目竟无一重复;他复据书根题字“雨窗集”、“敬枕室”笔迹,考定其为天一阁旧藏。数年夙愿,得偿一旦,这令素来十分谦让低调的马廉,难抑兴奋之情,他得意地声称:“真是小说史上一段佳话,而为我平生的一桩快事。”

这12篇话本小说,后来经考证,与后世改编的多种话本小说均有关联,诸如著名的冯梦龙、

凌蒙初“三言二拍”系列、《金瓶梅词话》、《古今小说》、《续金瓶梅》等。换句话说,在马氏的新发现中,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又找到了许多年代更久远、更接近于原本的原始话本。这一发现上,哥伦布式发现。

1934年8月,马廉将新发现的12篇话本小说整理影印出版,命名为《雨窗敬枕集》;并撰写了《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敬枕集序》。除了简介发现经过及与日本版本的比较研究之外,结合自身藏书及所见闻者,马氏首次将15篇“清平山堂话本”与12篇《雨窗敬枕集》合并一体,与《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古今小说》、《京本通俗小说》、《熊龙峰刊四种小说》进

行比较研究。这份研究成果,不但对“三言二拍”系列研究的可贵贡献,而且在至今未能发现更多新文献的情况下,代表了一种研究高度。在这一高度背后,也间接表达着,那个时代幸运发现者的喜悦与普通研究者的无奈。

诚如同为俗文学研究者及藏书家的郑振铎在《幻影》一文中,深有感触地写道:“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戏剧史的人,真觉得如今是一个大时代。假如你写了关于这方面的一部书,每过了一二年,准保你要将你的著作修改一下。因为新的材料一天天的出现,逼得你不能不时时刻刻在搜集,在研究。你有时因了新材料的发现而大感刺激与兴趣,有时却也要有些懊丧,因为这些新材料也许会将你的著作中的定论完全推翻了,或至少要修正一部分,或添加一部分。”马廉所代表的那个时代,让先是兴奋着的日本学者也多少有了一些懊丧,也让懊丧着去日本访学的中国学者们多了一份自信与坚定。

天一阁外雨窗前,马廉在一页半纸的古籍故旧中,一砖一瓦地垒砌着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巴别塔。塔外的观者叹之弥坚、仰之弥高,塔里的继承者则还在累积与探索,期待着更上层楼。就在马氏逝世后不久,阿英在一堆用作裱补书籍的破纸片中发现了《六十家小说》中的一种“梅杏争春”(尚有“翡翠轩”一种,但据阿英本人考证非《六十家小说》中内容,实为另有所本),可惜只有区区五张残页,但也是不小的发现,就此为《六十家小说》又增一种。阿英之后,竟至今再也未有相关文献发现,28篇的文本规模沿用至今。当然,主体仍是原藏日本与马廉所藏的27篇文本。

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将“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影印的《清平山堂话本》与《雨窗敬枕集》合编为一册,并作了初步整理,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与读者使用这部旷世珍本。但遗憾的是,这一册合编本,对影印原本中存有的泯漫不清楚、墨钉、空白部分加以修订正,其中当然有修订正确的,但有许多修订据后来考证是有误识与偏差的。紧接着,1957年谭正鹄仍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影印原本为底本,重新做了全书校注。应该说,谭氏校本是继马廉影印《雨窗敬枕集》之后,对这部古本小说展开全面整理研究的继往开来之作。之后30年间,“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

的影印原本与谭氏校本成为中国研究《六十家小说》的经典底本。1990年,石昌渝正是以这两部经典底本为参照,辅之以明万历刊本《绣谷春容》等稀见古本小说集,加以重新校点,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以“中国话本大系”丛书之一种出版发行。至此,《六十家小说》研究体系的基础,即以日本所藏《清平山堂话本》15篇、马廉藏本《雨窗敬枕集》12篇,共计27篇为主体的所能参照的底本体系基本构筑完成。

眨眼忽忽又过去了20年,《六十家小说》仍然没有新的原刊本文献被发现。但对目前尚存的27篇底本主体的研究与探讨仍在继续。2011年7月黄山书社推出了曾昭昭、刘玉红校注的《清平山堂话本校注》,针对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对漫漶、墨丁、空白等处的大量修补,著者认为其中有不少违背了影印古籍的初衷,并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新一轮的对马廉逝世后70余年间《六十家小说》相关研究的梳理与反思。应该说,这部“新校注”为《六十家小说》的主体文献研究重新注入了新的思路,旧底本做出了新视野。

今年3月,正值中华书局百年华诞之际,程毅中的《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又悄然面世。此书仍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影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和马廉藏本《雨窗敬枕集》为底本加以点校,坚持了以明代原刊本为原始工作底本的严谨学术立场。而此书的注释部分则别具一格,每篇均详译该篇故事的著录和流传情况,侧重于具有时代特征的词汇和名物制度的解释。可以看到,这部“新校注”的特点是,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基本保持原貌又比较可读的版本;另一方面又寓研究于注释,不仅疏通了文意,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历史文献和语言文字的例证,为话本找出比较确定的时代特征。

这部“新校注”,不但将《六十家小说》的主体文献研究贡献力量,更展示了所谓“名物学”学术传统在中国源发地的应有之力度。在二战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开创的“名物学”学术体系中,中国学者某种程度上的缺席与无语,这一次将由这部“新校注”举重若轻地予以回应。将“名物学”与“话本小说”进行整合研究,其中梳理出来的新线索与新发现,蕴藉其中的新意与创见究竟若何,还静待众多“话本小说迷”们耐心咀嚼与用心体会。相信马廉80年前的发现不会寂寥无续,更不会束之高阁,《清平山堂话本》体系以及《六十家小说》总体研究的新篇章还将续写,新的发现与喜悦还将继之而来,绵绵不绝。

周氏兄弟与中华的文字之交

顾钧

1914年2月,在刚刚创办的《中华小说界》上,周作人发表了12则《艺文杂话》。该文缘起是苏曼殊的一段文字。苏曼殊在《文学因缘》“序”中说:“诗歌之美,在音节长短之间,志非译意所能尽也。”周作人指出:“此非汉诗为尔,即欲翻西诗为华言者,亦不可不知此意。”以此为切入点,周作人在《艺文杂话》一文中陆续分析了裴伦(拜伦)、绥夫兼珂、亨凯、萨福等人的诗歌。其中讨论海涅的一则杂话收录了鲁迅的译文:“赫纳(Heine)者德意志诗人,能以常言抒其覃思,使字明瑟,而句复温丽雅驯,拟者不能一似。伯儿堂译其若干什,今录数首于此。一曰:余泪涓涓兮,少女兮,使君心其爱余,余将捧梨花而献之。流莺鸣其啾啾兮,傍吾欢之哭。一曰: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百合皎洁兮君柔荑,吁嗟芳馨兮故如昨,奈君心兮早播落。”“伯儿”即指鲁迅。这两首诗的翻译后来收入《鲁迅译文集》第10卷《译丛补》。周作人在早年的文言翻译中,遇到诗歌,常常请鲁迅帮忙,如《域外小说集》中显克微支的《灯台守》一篇是周作人翻译的,但其中引用的密茨凯维支的诗,亦出于鲁迅的手笔。

出版于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的首次合作。上下两册共收入17篇短篇小说。其中的译文多数出于周作人,而全书的策划和编辑工作则是由鲁迅一手完成的。据周作人回忆:“他编辑自己的,更多是别人的稿件,抄写,编整,规定行款格式,找寻和描画封面图案,预备付印。最好的例子是

《域外小说集》,字型和行款,纸张,从旧德文的文艺杂志上借来的图案,许寿裳(按,应为陈师曾)写的篆字题目,都很经过一番经营。”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品质俱佳,代表“异域文化新宗”的译作由于过于超前,未能引起当时人们的足够重视。此后,鲁迅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翻译工作,直到1922年才和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另一本世界短篇小说集;但十几年间他对于别人译介的短篇小说始终非常关注。

在《域外小说集》之后出现的单行本形式的短篇小说专集中,比较著名的有林纾和陈家麟译的托尔斯泰的两个短篇小说集《罗刹因果录》(1915)和《社会声影录》(1917),两书共收短篇小说10篇。此外还有陈家麟、陈大镛译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风俗闲译》,上下两册,收短篇小说23篇,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稍后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该书除介绍西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外,还介绍了北欧和东欧国家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域外小说集》的事业。

鲁迅看到此书后十分高兴,曾在为教育部所拟的审查意见中说:“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审查意见中也指出了此书翻译中的几点“小失”:“然当此淫侈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据周作人后来回忆,这份审查意见也包含他的参谋:“大概在民国六七年之交,上海各书局出版的新书常常送往教育部请求审查,

虽然不是教科书,本来无此必要,但是审查核准之后,算是版权确定,有了保障,也是有益无损的事情。周君的《欧美小说译丛》也是审查的书之一……教育部主办这件事的就是鲁迅先生。其时他在教育部任职金事科长,属于社会教育司,正是办理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事业的。他见到这部《欧美小说译丛》,特地携回S会馆,仔细研究,几经斟酌,乃拟定了那一则审查意见书,随后由教育部发布的便是。”1917年初周作人离开绍兴来到北大任教,和鲁迅同住S(绍兴)会馆。审查意见原题为《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刊《教育公报》第4年第15期“报告”栏,该期《公报》于1917年11月30日出版。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域外小说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意义逐渐凸显出来。1921年,上海群益书社重印了这部译作,改署“周作人编译”,而此版的序言仍出于鲁迅之手。会稽周氏兄弟到这里还是不分彼此、通力合作的。但在他们思想的深处,分歧也开始出现了,预示着今后将各走各的道路。

1922年1月,武者小路实笃《人的生活》(李宗武、毛咏棠译)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日本新村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文本。鲁迅应请为译本做了认真的校读,《鲁迅日记》1921年5月31日有“校《人的生活》”迄,寄还李退邨”的记载,此书主要的译者李宗武是李退邨的弟弟。《人的生活》出版时题作《人的生活》,由周作人作序,序言开头写道:“李宗武君将他与毛咏棠君合译的《人的生活》寄给我看,说将要出版,嘱我作一篇

小序。我想武者小路君的思想,书中已经明白的表示;两君热心于新村运动,这译稿又经再三斟酌,其信达之处,读者自能了解,不必待我的赘说,我现在只略加历史的解嘲,聊以塞责罢了。”所谓“译稿又经再三斟酌”,就是指书稿曾经经过乃兄鲁迅的认真校订。按说鲁迅既然已为此书做了认真的校改,应当是为《人的生活》作序的最合适人选,为什么他不动手,却要请教当时在西山养病的周作人呢?现在看不到有什么材料能够透彻地解释此事。

周氏兄弟在1923年分道扬镳

的时候都已是文化名人,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写还是译,都是出版社欢迎的。而早年他们正默默无闻的时候,像所有的年轻作者一样,他们也有被中华书局退稿的经历。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除了翻译了后来收入《域外小说集》的若干短篇之外,还翻译了一些中长篇,其中之一是俄国作家阿历克赛·康·托尔斯泰的《银公爵》,译本改题《劲草》。1914年1月,鲁迅将周作人译稿寄往中华书局,稍后被退回。再寄回来,后译稿遗失。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鲁迅1909年4、5月间为译本写的序言,题《劲草》译本序》。除《银公爵》外,周作人在东京期间还翻译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代表作《炭画》,草稿于1908年底完成,由鲁迅修改善正。此后一直压在箱底。1913年2月,回国已一年多

的周作人将《炭画》寄给了商务印书馆,很快收到了商务的退稿信。小半年后,周作人又把译稿寄给了与商务齐名的中华书局,结果再次遭到退稿。在鲁迅的帮助下,后来《炭画》终于在1914年4月由文明书局正式出版。

无论是被接受还是被退稿,周氏兄弟和中华书局的文字之交都集中在外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外国文学领域。现在一提到中华书局,大家立刻想到的就是“古”和“中”,而不会想到“外”和“今”。其实中华早年的经营路径相当多元,既有备受学界欢迎的《四部备要》,也有老百姓喜闻乐见、印刷至20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的统计,中华在那一时期这方面的出版品种有200种之多。

新书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刘梦溪 著
2012年4月出版 29.00元

本书对中国历代文人的狂者精神做了细致入微的表述和分析。从孔子的狂狷起始,然后是秦汉时代文人的佯狂,魏晋士人的真狂,南北朝的由“竹林”到“田园”再到“禅林”,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狂,宋代除了苏东坡的诗酒之狂外狂狷没有成为思想潮流,明代则走到狂者精神的最高端,清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狂者精神已经彻底敛迹。现代社会我们看到了“狂妄之威”和“举国皆狂”。在作者笔下,这些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人独立的人格和学术精神栩栩如生。作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必然是以天地之正气为条件的。



《秋籁居琴课》
成光亮 讲授 程鸿媛等 整理
2012年4月出版 45.00元

成光亮不仅是古琴演奏家,更是音乐学者。本书是根据他在天津音乐学院讲课的录音整理。他在文论中所表达的音樂理念为核心,针对具体曲目,围绕乐曲音乐分析,详细讲解技法动作的要领。教学虽是讲解具体的琴曲,却是建立在整个中国音乐体系的基础之上。由于在民族音乐方面的深厚修养,作者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特色与艺术语言,内容讲古琴,而其思考并不局限于古琴,追求的是用“中国的、我们自己的母语的语法来解释我们的音乐”。对于音乐艺术教育的深度思考实际也启发了学琴人对艺术演绎的理解。

